



知株视频号



掌上株洲客户端



中共株洲市委主管、主办
株洲日报社出版

导读

豆瓣2024年十大年度图书出炉

第2版

史铁生的“地坛”使我沉思

第2版

探访醴陵板杉镇柴窑

第3版

珍稀濒危野生植物百山祖冷杉

第3版

圆梦长空

第4版

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
yzhy83@163.com



远眺湘江边的昭陵古镇

水墨昭陵

张雄文

秋雨绵软如春时，飘逸而舞，像画家酒酣耳热的笔墨，将昭陵古镇的江天，晕染成浓淡相宜的一幅水墨画。雨幕下呈弧形铺展的湘江，更见水乡韵致，也更粗犷而开阔，像浩瀚的入海口。它从拥挤的衡阳、衡东等都市逃逸而出，几十里后又将被迫进入同样憋闷的株洲城区，似乎心下焦急，赶紧在眼前葱茏拥挤的旷野肆意敞开胸膛，拥抱最自由最畅快清风，大口呼吸至纯至甜的空气。

岸边古镇也是水墨画的一部分，安谧淡雅。一条不宽的街道沿岸延展，长约两公里；靠水一侧是成排郁郁的杨柳、古樟、古槐或叫不出名的南方乔木灌木；另一侧则是青砖黑瓦或吊脚木屋，多为两层，明清建筑风格，古意浸漫。屋舍并不多，仅数十户，除了民居，还有年代久远的伏波庙、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电影院、冰棒厂旧址与同样老旧的火车站，散散落落地沿街排列，无一不烙刻着岁月的沧桑印痕，像银发斑斑的耆老。街面已非早年铺就的麻石，踏上去，却似乎依旧有古意从双腿漫溢而上，如一队蚂蚁决然向上攀爬。两三只大名“中华田园犬”的土狗卧在人家屋檐下，目光沉沉，仿佛正思考某种生活哲理，举伞的行人探头探脑而过，甚至有登堂入室之势，也丝毫不屑搭理。行人窃喜时不免遗憾：终究少了些“遥闻深巷中犬吠”的意境。

步入古镇，访古探幽者总有层出不穷的惊喜。一眼不大的水井蹲踞在街西头山脚一隅，麻石砌筑，井沿斑驳，呈正方形，古拙雅致。井边立有清代功德碑，镌刻着捐修者的事迹与姓名。井水清冽见底，能照出细雨霏霏和天光云影。掬一捧水入口，甘甜异常，非同寻常的饮品能相提并论。瞬间，我恍惚回到了数百里外儿时生活的乡下老家，那里也有一眼甜水井，是我“背井离乡”前最温馨的地方。吃水不忘挖井人，目光再次抚摸功德碑上一行行姓名，我虽非昭陵人，敬意也绵绵涌出。井边葱茏的小山称唐皇岭。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，何况有唐皇。但究竟与哪位唐皇有关，尚未有确切考据。不过，山上确有明清古墓群，山下古镇东头，还有宋元时期的文化遗址，出土过

不少陶片、瓷片、宋时青砖和铜钱。

立于小山之巅，楚天开阔，远处云端，南岳衡山隐隐在望，眼前湘水烟波浩渺，古镇屋舍，令人不免生出“江山留胜迹，我辈复登临”的感慨。昭陵位于湘东渡口一角，自然并非陕西礼泉安葬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，与南北朝时期北周明帝的陵寝之地也毫不相干，甚至从未有过镇的建制。这里早年仅是小渔村，后来才有集市与小街，溯其源却大有来头。东汉建武十七年（公元41年），光武帝拜麾下大将马援为伏波将军，发长沙、桂阳、零陵和苍梧四郡之兵南下，远征交趾（今越南）平叛。马援奉旨率部登舟疾行，沿湘江而上，到昭陵所在的渔村时，十分欣喜，当即选为屯兵操练之所。之后，他率汉军长驱南下，最终凯旋。

五代十国时期，盘踞湖南的武安军节度使马殷，尊马援为祖，报请后唐皇帝追封其为“昭灵英烈王”。在马援当年屯驻之所立伏波祠祭祀。于是，小渔村有了文绉绉的“昭灵”之名。乡民们还自发建了伏波庙，常供香火，也就是街上至今犹存的那座古庙。日子一久，乡民以讹传讹，将“昭灵”误为“昭陵”，又一代一代传了下来。马援并非帝王，声名却远超一般帝王，他战胜攻取，所向披靡。他的称号“伏波将军”原本仅是众多杂号将军中一个，与名爵显赫的大将军、驍骑将军、车骑将军、卫将军，以及前、后、左、右将军不能比。但自五代十国之后，再无人受封伏波将军。究其原因之一，大概是时间长河大浪淘沙，马援越来越受后人推崇，这一名号已成为他的专有尊称。民国时期护国名将蔡锷病逝后，孙中山抱病撰写挽联：“平生慷慨班都护，万里间关马伏波。”“伏波”即马援，他将蔡锷与伏波将军并列，足见蔡锷在其心中的位置。

一般人有马援的武功，便足以垂之史册而不朽，人生达此，夫复何憾。马援却不止于此，还为汉语词库留下了三个壮气满溢的成语。他把积攒的



昭陵古镇上的伏波庙

财产牛羊全部分送他人，说一个人做守财奴没意思，“丈夫为志，穷当益坚，老当益壮”。他出征获胜而归，别人前来祝贺，他慨然说：“男儿要当死于边野，以马革裹尸还葬耳，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邪？”他写信教育子侄，叮嘱说：“效季良不得，陷为天下轻薄子，所谓‘画虎不成反类狗’者也。”老当益壮、马革裹尸、画虎不成反类狗（狗）三个成语，成为马援为中华文化作出不俗贡献的注解。

因为马援，昭陵这幅水墨画有了深沉的文化底色，又兼地处水路南下衡阳、广州的必经之地，渐渐成为闹市。河面帆影如林，街上铺面相连，熙熙攘攘。

文人墨客也慕名而来，唐代杜甫、刘长卿、柳宗元，宋代米芾、文天祥、范成大，清代彭玉麟、左宗棠等都曾买舟前来，驻足于此，领略马援的遗风流韵。他们盘桓在昭陵山水间，啜一碗甘甜的井水，或饮一杯乡间浊酒，细细品味这幅水墨画的灵秀与深沉，自然少不了诗词吟咏。

唐代杜甫徘徊江岸杨柳树下，思索“得失瞬息间，致远宜恐泥”的哲理；宋代雷发瞻拜昭陵伏波庙，先感慨“功名妾媵后人知，马革何妨死裹尸”，尔后高声吟咏：“堕水站鸫无处问，滩头斜照晒鸡鸣。”清代丁德奉过昭陵，更是深情描绘眼前的图画：“秋老滩声壮，天寒雁影多。停梳沙浦晚，把酒听渔歌。”因为这些吟咏，得马援这位武将而豪气干云的昭陵，又有了文脉绵绵的厚重与温馨。

多年后，我置身这幅水墨画中，虽早已物是人非，古镇的喧嚣也已不再，却如饮醇酒，不觉沉醉于绵绵雨丝里。

众口纷纭余溪村

文志勇



余溪村入口醒目的牌楼

块有鸟有溪又田野开阔的地带称之为“余(mi)鸡垅”——“垅”在醴陵的通俗讲法，大意为“水田多且地势平坦开阔之地”——大约当时的乡民不知这个“mi”鸡子的“mi”字怎么写，就想当然地认为既然鸟一看见人来了就潜入水中躲藏起来，就用“入水”这个“余”的会意字代替好了，因为用的人多了，久而久之，就把这个字和音固定沿用下来了。查阅余溪村李、张、彭等姓氏族谱，均注明这个村庄自明洪武初以来一直叫“余鸡垅”。

民国版《醴陵县志》中，共有7处载有与余溪村相关的资料。如卷一载“余鸡垅，属清正乡第四保”；卷六载“李姓总祠在县城，其落业世居地点之一的余鸡垅，始迁祖籍在江西吉安，于清康熙年间迁醴，当时有人口22人，宗祠一所，存四修族谱”；又载“张姓始祖祖和，原籍在江西宜春，于明洪武初迁醴，落业世居地点在沭塘陵，分支地点在株板樟、余鸡垅，时有人口623人，有宗祠一所，存四修族谱”；卷十载“水冲庙，在治东余鸡垅，距城62里，清咸丰年间建”……这些资料足以明证余溪村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一直叫“余(mi)鸡垅”，而非“余溪”。

1949年8月，醴陵县行政区划调整，余(mi)鸡垅的名称依旧。1950年2月，醴陵县开始建立乡村政权。至5月，划全县为11区1镇154个乡7个居民委员会，余溪村属一区中的18个乡之一，定名为“余溪乡”。当时改“余鸡垅”为“余溪”的原因，可能是乡区领导认为“余鸡垅”这一名称粗俗土气，故据其谐音改为典雅且富有诗意的“余溪”之名。从此，“余溪”这一村名就固定沿用至今。只是，就我个人感觉而言，“余溪”这一村名雅则雅矣，却似乎少了一点地方特色和历史底蕴。1956年5月，全县250个乡镇并为46个乡，余

溪、古塘等7个乡镇并为白兔潭乡。1958年9月，撤销乡镇建制，成立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，余溪叫余溪大队。1984年，改变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，余溪大队改称余溪村。此后40年来，全县(市)虽有几次大的区划调整，余溪村的名称却一直未变。

1981年，当时的醴陵县地名普查办公室根据国务院、中国地名委员会及省、地地名领导小组统一部署，在全县开展地名普查工作，将地名资料进行全面归纳整理，并于1983年11月汇编成《醴陵县地名录》一书。为了尽量做到字、音、义规范一体，书中以湘方言“沅(mi音)”代替“余”字，定“余溪大队”为“沅溪大队”。但此举并没有得到余溪当地人的认同，地方上日常常用文及村委会牌子、公章，仍坚持使用“余溪”这一传统字样。

其实，当时醴陵县人民政府以“沅”字代替“余”字，是有据可依的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《古汉语常用字字典》里载：“沅，mi音，深藏的样子。贾谊《吊屈原赋》：‘哀九渊之神龙兮，水深藏以自珍。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《湘方言考释》(彭逢渊主编)里对“沅”的注释为：“沅，mei或mi音，潜入水中。射沅(mi音)(益阳、娄底、长沙方言)；沅(mi)鸡子(长、娄方言)，一种善潜水的水鸟。”醴陵自西汉以来，曾长期隶属于长沙地区，地方方言与长沙方言部分近似也属正常。这样字、音、义协同一体，应无可非议。1995年版《醴陵县志》就采纳了这次普查成果，使用“沅溪”的写法。查1998年版《萍乡方言词典》(李荣主编)也有词例：沅(mi音)鸡(仔)，水禽，体小如雏鸡，捕鱼也。叫“沅水仔”。但2005年版《醴陵县志》为了尊重当地镇村两级的意愿，还是重新恢复为“余溪”，当然我们醴陵人还是把“余”字读为“mi”音。



蔡承植 是君子亦是“神仙”

郭亮

一枝藤有大因缘，挂到山巅别有天。
古树千章围辟雍，悬崖半壁立云烟。
才游白日飞升处，又到司空洗药泉。
屈指齐梁千载后，宰官唯尔是神仙。

湘东攸县，城东北五十里处，有一青山，重峦叠翠，泉清水冷，名唤司空山，据传为南齐司空张巴玉飞升成仙之处(事见梁任彦升《述异记》)，至今仍存三清峰、朝斗石、洗药池、凤凰洞、炼丹池等张司空采药、炼丹、修炼遗迹。此诗便是赋张司空洗药池遗事——首联、颌联叙眼前之景，颈联叙自己这一日游司空山的行程，尾联则借张司空之事抒发胸臆，自齐梁而今，千余年来，能白日飞升成仙的高官也就张司空一人而已——作者是明万历年间的南京太仆寺少卿、著名佛家居士蔡承植(字槐庭)。

以清廉化俗

蔡承植，字槐庭，明嘉靖丁巳年(公元1557年)二月初五日出生在攸县深田镇的一个科举世家——深田蔡姓始祖为曾任安仁训导的蔡朝端(字雪松)，立下“笃学苦读”之祖训，且祠堂对考取功名者有一定奖励，其下秀才、举人代有所出，至蔡承植已传至第九代。

万历八年(公元1580年)，蔡承植考取庚辰科进士，时年二十四岁。按理说，出身科举世家，又得中进士，接下来就该好好向族中先于自己取得官职的族人好好讨教，以求仕途之路走得更顺畅一些。可让人奇怪的是，蔡承植竟然在得中进士后“发愿长斋素食，行头陀行”，还不止说说而已，《南岳志》载其“食必粗糲，客至，炉中煮一茎菜，以手撮菜叶，共啖之。每夜危坐匡床，断房事三十年……”

遗憾的是，现存史料已无从稽考何以一个新科进士忽然就成了虔诚的佛家居士，但些并不影响蔡承植在仕途之上的步步高升，先任南池州(今属安徽)教授，继任建宁(今属福建)推官，然后奉调回朝，先后任南户部、礼部郎中，再外放嘉兴知府，继任广东按察副使，最后以南京太仆寺卿(从三品)致仕。

嘉兴，地处江南，向为膏粱锦绣之地，地方上奢侈之风颇盛——反正不差钱嘛——蔡承植上任后，“以清廉化俗”，前已说过，蔡承植本就以苦行的方式践行着自己的修行，身为一府之长的知府以身作则躬行简朴(甚至都不能说是简朴，简直可以说苛刻了)生活，底下的大小官员，包括地方豪强还好意思继续之前的奢侈生活吗？故，蔡承植任内“奢侈之风顿敛”。

不仅仅是以身作则地感化，更多的时候，蔡承植对当时的官场弊端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，他曾说过“宦中人，鲜为民，最上则为名耳”，意思是说这些当官的没几个好鸟，那些所谓的好官也只是求个好名声而已，他却不要这个好名声，只踏踏实实为老百姓办实事，任南京户部郎中时，“清屯政，调边饷，理盐法”，这都是得罪人的活儿，极易落人口实，可蔡承植却不管这些，埋头苦干，卓有成效，时人有“四君子”之谓。

神仙就是蔡槐庭

以南京太仆寺卿致仕后，蔡承植回了老家攸县，结一草庵，带领周边父老终日念佛不绝。当地民间传说攸县山间“十里一亭，五里一碑”的德政就起因于蔡承植。

说是退休后的蔡承植去攸县东乡有事，带着两个随从与四个轿夫一路东行，渐渐入山。正值盛夏，山间路窄而陡峭。轿夫汗流浹背地喘着粗气，抬着轿一步一步脚印，使劲往上爬。蔡承植于心不忍，只好下轿行走。中午时分，大家口渴、肚饥，筋疲力尽，山中又没有人家，蔡承植叫大家就地歇一歇。

刚坐下，便听得不远处传来歌谣：“高山流水响叮当，我挑煤炭下山岗，有朝一日亭中生，茶水相伴好歌凉，不知何日神仙到，为我挑夫解烦忧。”歌声落下，人正好与蔡槐庭相遇。蔡承植便叫挑夫坐下歇歇，聊起家常来。挑夫是西乡人，从东乡挑煤回西乡，只是这一路之上尽是崎岖山路，也没个人家，中途想讨口水喝，歇下凉也没地方，这才唱着自编的歌一路走来一路唱地解个闷子。

蔡承植听罢，便问那挑夫，可是想在此地建个歇凉的亭子，挑夫答，除非神仙下凡，不然有谁会愿意他这样的穷苦挑夫的想法。蔡承植听后便不再言语，只说日后肯定会有。

不过三两个月，蔡承植便说动地方官在当地建了一座凉亭，地方官为讨好蔡承植，还特意在凉亭之上题了一首诗，曰：“茫茫峻岭路延伸，重重山峦溪水清，脚肩相挨盘山路，直入云霄无踪影。峭壁悬崖雾锁嶺，狼啼虎啸隐约闻。踏破黄丰又凤岭，深山脚下又乘船，沿途美景不胜收，定叫槐庭再相闻。”

那位挑夫某日又前去东乡挑煤，见到这凉亭颇是吃惊，又见凉亭之上的题诗，心知自己早两个月遇上的那位慈眉善目的老者便是蔡承植，当下提笔在凉亭的题诗之下又加了一句话——“神仙就是蔡槐庭”。

自此以后，“神仙就是蔡槐庭”这话便传遍了攸县境内，地方官迫于民情，联合当地士绅，在一些人迹罕至的山路之间，十里建个亭，五里立块碑，直到新中国成立后，攸县许多地方还保存着凉亭和路碑的痕迹，这都是当年蔡承植留下的“德政”。